

五〇、六〇年代臺灣文學掠影

——臺灣現代主義文學之興起

文·圖片提供／應鳳凰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）



▲林海音兼具作家與主編身分。

一九五〇與六〇年代，就時間座標看，正是國民黨從大陸撤退臺灣「最初二十年」，政治經濟還不夠穩固，處於「用力調適」階段，語言文化也是。國民黨政府一上岸，將日治以來臺灣社會用慣的日語，跟日本人剛到臺灣作法相同，先做「消毒」：把「舊語言」從各角落清除乾淨。此時文壇成員清一色來自大陸，由於語言文字從上而下強制轉換，政府改「北京話」為臺灣人的「國語」，此一環境讓有志寫作的本地文化人不得不在學

習中文的起步階段。

官方政策與反共題材

各種「臺灣文學史」書寫，多把這二十年文學「前半期」稱為「反共懷鄉時期」，1960年以後十年稱為「現代主義文學時期」。此「分期方式」顯然不妥當——前者是文學題材，後者文學形式，並不合分期原則。然而兩段合在一起，倒扼要說明了二十年主流文學的「題材與形式」。在文藝政策操控下，不是官方提倡的「戰鬥文藝」，便是大陸文人「思舊懷鄉」的軟性文

學。前者有官方獎金，後者有市場及稿費。按葉石濤《臺灣文學史綱》說法：此時文壇由「大陸來臺作家所把持」，大批配合黨國宣傳作品乃「政策下產物」，藝術價值不高，稱其為「白色而荒涼」的文學。若從大陸人自身的角度，則認為「反共」是他們「親身血淚經歷」，動亂歲月作品更能反映「時代精神」。

反共題材盛行與政府鼓勵鼓吹有關。國民黨中央動員作家成立「中國文藝協會」，砸大錢辦文藝獎項，組織「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」廣向各方徵稿。隨政府來臺更有大批軍人，「美軍協防臺灣」之後雖已無仗可打，為「鞏固軍心」，同樣在軍中獎勵創作。「軍中文藝運動」推行成效，從「軍中三劍客」：司馬中原、朱西甯、段彩華等大批軍旅作家活躍於文壇可得知。但不論官方鼓勵與否，藝術性高的作品才禁得起時間考驗。反共長篇小說如張愛玲的《秧歌》、潘人木《蓮漪表妹》、姜貴《旋風》等，至今書店仍可買到，說明它們仍有讀者及市場。

民間雜誌與現代文學

不只語言，國民黨初到臺灣同樣在思想上認真「消毒」，例如通過戒嚴法查禁中國左翼作品：五四



▲《癡弦詩抄》是他詩集初版。

▲郭良蕙的《心鎖》剛出版就被查禁。

作家從魯迅、茅盾、巴金、沈從文以降的出版品一律查禁。官方媒體之外，文壇還不至於太「白色而荒涼」的原因，幸虧有大批文人前仆後繼辦雜誌，提供精神食糧，如普及於大眾的《皇冠》、《野風》月刊，普及於軍公教的《文壇》、《作品》、《純文學》月刊。更有學院裡，如臺大夏濟安教授辦《文學雜誌》，白先勇、王文興等人編《現代文學》，政大尉天驄繼《筆匯》之後，辦一系列《文學季刊》、《文季》雙月刊等。這些刊物除了譯介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潮與前衛作品，也大量刊登本地作家的創作，產生一批重要小說家如白先勇、七等生、王禎和、黃春明、陳映真等，民間辦的「小雜誌」反成了臺灣現代主義文學的重鎮。

即使非純文學性的《自由中國》、《文星》雜誌等，同樣對文壇或文藝思潮有可觀影響

力。此時報刊文藝欄主編常兼具小說家身分，前者如聶華苓，她從1949年《自由中國》創刊，編到1960年雷震被捕雜誌結束，也是小說《失去的金鈴子》《桑青與桃紅》作者。後者如林海音，她既是「聯合副刊」（1953~1963）主編，也主持《純文學》雜誌，又是小說《城南舊事》作者。這時期女作家受讀者歡迎的程度更勝於男作家，小說方面如郭良蕙、孟瑤、張漱菡、繁露，散文方面如琦君、艾雯、張秀亞、羅蘭等，可能比同時期男作家如王藍、陳紀澄、彭歌，散文家如吳魯芹、梁實秋、陳之藩等人的書更具有市場競爭力。

作家的邊緣戰鬥

二十年間文壇，有「兩個年

份」特別能看出文學潮流的轉折。其一是1956年，這一年國民黨高額「中華文藝獎金」停辦，夏濟安的《文學雜誌》同年創刊。值得注意的還有詩人紀弦，這年他宣布「現代派」成立，提出「詩乃橫的移植」等六大信條。藍星、創世紀、現代等「三大詩社」先後成立，現代詩壇漸趨活躍。幾位著名軍旅詩人其實早在此時都出版了生涯的代表性詩集，如鄭愁予的《夢土上》（1955），洛夫《靈河》（1957），《癡弦詩抄》（1959），商禽《夢或者黎明》（1969）。

在文壇邊緣的，還有一群相濡以沫的省籍作家。埋頭學中文有成的小說家鍾肇政除了不斷投稿，還集合鍾理和、廖清秀、李榮春等省籍作者，用手刻鋼板出刊《文友通訊》，讓本土文學一脈香火綿延不絕。1964年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年份：吳濁流創辦《臺灣文藝》雜誌，同年推出《亞細亞的孤兒》中譯本；以本土詩人為主的《笠》詩刊創刊，本土文壇漸次蓬勃興盛，為即將到來的鄉土文學時期及論戰預先鋪出道路。



▲1960年白先勇（前排右二）、陳若曦（前排左一）等臺大外文系學生創辦《現代文學》。（圖片提供／莊永明）